



十三行学术丛书

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

GUANGZHOU SHISANHANG YU QINGDAI ZHONGWAI GUANXI



主编：赵春晨 冷东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十三行学术丛书

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

GUANGZHOU SHISANHANG YU QINGDAI ZHONGWAI GUANXI



主编：赵春晨 冷 东

十三行学术丛书编委会

主 编 赵春晨 冷 东
副主编 章文钦 谭元亨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楚坚 刘晓明 陈伟明
李庆新 杨宏烈 冷 东
赵春晨 章文钦 谭元亨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 赵春晨, 冷东主编.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3. 1

ISBN 978 - 7 - 5100 - 5690 - 1

I. ①广… II. ①赵… ②冷… III. ①十三行一文集
②中外关系—国际关系史—清代—文集 IV. ①F752.949 - 53
②D829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7186 号

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

责任编辑 萧宿荣 康琬娟

责任技编 刘上锦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邮编:510300)

电 话 (020)84469982

网 址 <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广州嘉正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32 开

印 张 18.75

字 数 480 千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0 - 5690 - 1/K · 0171

定 价 68.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丛书编委会

主 编 赵春晨 冷 东

副主编 章文钦 谭元亨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楚坚 刘晓明 陈伟明 李庆新 杨宏烈

冷 东 赵春晨 章文钦 谭元亨

《十三行学术丛书》总序

赵春晨 冷 东

关于广州十三行，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曾有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广州竹枝词》）写的是当时广东中外贸易繁盛和十三行财富充盈的景象。其实作为鸦片战争前长期经营中外贸易、充当中西交往桥梁的十三行，不单只是物质贸易繁盛和财富的象征。20世纪研究十三行的著名学者梁嘉彬写道：“研究十三行者往往泛论其对外贸易而止；余考知西洋文物之传入除由货易得来者可以毋论外，其若西洋楼台、炮台、战船诸物之建造，西洋医术之介绍（郑崇谦之传种牛痘，伍崇耀之设立眼科医院可以为证），欧美外情之采访，甚至近代银行事业之仿行，中外货币之倾融兑换，莫不以十三行为其嚆矢。”（《广东十三行考》）吴晗先生更从明清历史演变的大视角上立论道：“从‘锁国政策’到‘五口通商’，在这两个最大的转变契机上，广东十三行是一个重要的枢纽。”（《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可见十三行在其存续的一个甚至两个多世纪里（十三行起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故而其存续时间不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实在要广泛和深远得多。鸦片战争前的一两个世纪当中，对于正纷纷东来的西方人而言，十三行是他们与中国贸易和交往必须通过的中介及桥梁；而对于正面临世界一体化大潮的国人而言，它则无疑是中国开始接触与融入世界的一个起点。鸦片战争后，十

三行垄断中西贸易的制度被废除，十三行商馆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完全焚毁，从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十三行仍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为中国留下了大量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遗址、遗物与精神的财富，也为世界留下一条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历史文化的纽带。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去开发利用其资源。

有关十三行的学术研究，早在 20 世纪前期已经开始，广东学者梁嘉彬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 1937 年出版的《广东十三行考》（南京国立编译馆初版）一书，成为此项学术研究的奠基性作品。此后陆续有一些国内外学者继续致力于此项工作，使得十三行研究绵亘不断，至今已经成为具有国际性的研究领域。但是就国内而言，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研究工作几乎停顿数十年之久，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后才得以恢复。而且因为研究力量的分散、资料发掘存在难度，以及文献研究与资源现状调查、开发利用的规划设计缺乏密切配合等原因，迄今研究工作尚未有大的突破，不仅就学术而言，尚未能从总体上超越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的水平，而且在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上，也缺乏全面的规划与设计，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需要的。

有鉴于上述情况，在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的关心和学界朋友的支持下，广州大学于 2009 年组建成立了“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并被批准为“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我们组建这个专门研究机构的目的是，在于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一个进行学术研究、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对于广州十三行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深入研究，并借助对于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为广州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积累和现代化发展做出贡献。“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成立后，根据上级领导和学界朋友的期望，致力于组织和开展十三行的学术研究、十三行资料信息的汇集和收藏、十三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沟通与联络广州十三行后裔等，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出版这套有关十三行的学术丛书。

我们深知，十三行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历史、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必须立足广州，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进行多角度、多语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吴晗先生在上世纪就曾提出，“研究这问题有几种困难应该克服，第一是史料的搜集，所有各种文字中关于这问题的记载，尤其是中文材料，都应一一加以研究和批评。第二是实地的采访，除文字的记载以外，还应从行商的后人和父老的传说中采访遗事，和文字的记载互相印证比较。第三是历史的研究，除横的方面就十三行本身作研究外，因这制度和历代市舶制度有关，更须向上追溯，作一纵的探讨。”（《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我们期望，通过这个丛书的编辑出版，集学界各位同道之力，能够在上述史料的搜集、实地的采访、历史的研究几个方面皆能有所收获，同时能够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球化的宏观视野审视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科学的规划与开发，使十三行历史文化资源能够更好地为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这个丛书定名为《十三行学术丛书》，就内容而言，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收入本丛书的，应是与十三行有关的作品，范围包括十三行的制度、行商、中外贸易双方的情况、中西文化交流、相关历史背景、文化资源遗存、研究状况等等；二是这些作品应是学术性质的，即属于研究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与翻译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就形式言，既云“丛书”，自然是由多部作品构成，但是由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逐步进行的，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同时推出，需要陆续编辑和出版，此点还请读者予以谅解。同时在整个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殷切希望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及时予以修正，提高丛书的质量。

目 录

赵春晨、冷 东：《十三行学术丛书》总序·····	1
戴鞍钢：广州十三行与中西贸易演进·····	1
张晓辉：命运逆转：清中后期的鸦片商与十三行行商·····	14
李龙潜：试论清代华南海运贸易的特点·····	30
王元林：清代中后期江南外销丝货的国内流通与十三行在外销丝货 中的作用·····	39
冷 东：十三行与影响世界的茶叶之路·····	56
范岱克：广州商人陈安官 1751—1790（蔡香玉中译文）·····	74
顾伟民、谢 放：十三行行商伍氏商名演变初探·····	83
谭元亨：封疆大吏对清代对外贸易的作用与影响——以杨宗仁、杨 文乾、杨应琚祖孙三代为例·····	97
胡文中：在世界贸易博弈中，中国舆论缺位的教训——清代十三行 由盛至衰的原因之一·····	121
郭小聪：十三行行商的负担对中外关系的影响·····	135
苏珊·索普：西瓜扁艇：广州十三行商业体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 （蔡香玉中译文）·····	153

赵春晨：行商与商馆区：清代广州“十三行”一名的双重含义及对今日研究之启示	160
刘凤霞：繁华都会与鬼魅——从十三行为主题的中国外销画看口岸文化的发展	167
丽莎·赫尔曼：广州贸易的社会关系——瑞典东印度公司的信息流动、信用、空间与性别（蔡香玉中译文）	189
刘 勇：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探析	223
蔡香玉：乾隆末年荷使在广州亲历的国礼与国宴	239
李立凡：1821年 Emily 号事件的报导与传播	253
黄启臣：十三行商领潮接纳西方文化——广州十三行商与广州城市文化研究之二	277
吴伯娅：广州十三行与入华传教士	366
苏 精：裨治文在十三行（1830—1833）	385
王丽英：浅论十三行行商的道教情怀——以伍氏家族为例	406
王发志：十三行与广州陈家祠建筑	416
潘剑芬：同文（孚）行与中外商业文化交流	429
李 云：十三行洋商叶上林家族与伊秉绶	438
闫晓青：叶廷勋的社会交往及其诗作考——叶氏墓表碑考证	464
陈瑞林：十三行、喇叭、医学图画与近代中国写实绘画的兴起	478
白 芳：风行欧美——清代中国外销艺术品	491
涂成林、魏伟新：以建设“十三行博物馆”为契机，打造广州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	496

杨宏烈：遗产廊道旅游景观的系统保护与开发——以广州至珠江口古炮台遗产廊道为例	509
赵立人：十三行商人策划“借师助剿”的失败——三合会围攻广州之一幕	523
潘刚儿：读潘仕成撰写的“骂鬼”诗	530
梁承邨、叶秀彝：读《番禺黄埔梁氏家谱》札记——有关十三行行商天宝行和黄埔古村（港）某些情况的窥视	537
姚继斌：半世纪前香港中史教科书中的广州十三行：以钱清廉史书为例	548
章文钦：《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	565
冷 东：《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569

广州十三行与中西贸易演进^①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戴鞍钢

摘要：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清政府实行的是行商制度。广州的对外贸易，由清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专营。清朝政府旨在利用行商避免与外商发生直接关系，行商实际充当了清朝政府与外商之间各种交涉的中间人。在政府的授权下，“十三行”商人总揽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从中获利巨大，并因此与粤海关监督及广东地方官员结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官府方面，则把行商视为摇钱树，动辄巧立名目，伸手索取。五口通商后，一些原在广州的中国人，也追随外商来到上海。他们中有的原先的行商。行商制度结束后，行商各奔前程，结果不一，有的破败，有的随外商北上，在新辟的通商口岸上海寻找商机。

关键词：广州十三行 行商制度 中西贸易

近年来，有关广州十三行的研究引人注目。专题档案标志性整理成果及其相关论著，有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集的《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精选》（广东经济出版社，2002年），以及李国荣主编的《清朝洋商秘档》（九州出版社，2010年）等；系列研究成果，则首推广州大学十三行研究中心学者们的贡献。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

①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项目批准号：11AZS006）的阶段性成果。

础上，着重论述广州十三行与中西贸易演进的关系，向大家请教。

—

清朝初年，为了对付东南沿海特别是据守台湾的郑成功集团的反清斗争，清政府曾先后宣布严厉的“海禁”和“迁海令”，逼迫闽、广、江、浙等省沿海居民内迁50里，有越界者斩。1685年（康熙二十四年），清朝统一台湾。次年即下令开放海禁，允许商民出洋贸易，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中外贸易又趋活跃，广州尤为突出。

广州很早以来，就是华南地区重要的商港。“海禁”取消后，外国商人又纷至沓来，其中不少是英国人。康熙五十五年（1716），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指令，在广州正式开设商馆，负责对华贸易的拓展。它最初由随船来华的英国商人临时组建，设有主席、司库、出口货物和入口货物主管。1770年后，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专门派来的代表取代。

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于1600年，此后通过武力先后强占了印度、新加坡和缅甸的部分地区，并垄断了英国的对华贸易，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其商机，很大一部分来自当时欧洲人品味中国茶的风尚。这种“中国风尚”的流行，是明末以来在中国与西方的交往中，通过传教士及欧洲知识界对中国文明的阐释，以及中国的文物在欧洲广受青睐，而使欧洲人产生对中国人生活方式的向望。喝茶是体现这种向望的方式之一。当时世界上只有中国产茶和出口茶叶，且价廉物美，这个消息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喝茶要用茶具，中国的瓷器随之畅销。18世纪中叶时，不单是上流社会喜好品茶，一般平民也都喝茶，有专门的茶店，也有人沿街叫卖泡好的茶水。1784年英国首相庇特估计，约有2/3的英国人每年人均消费3磅茶叶。^①

^① 陈国栋：《东亚海域一千年——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对外贸易》，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27页。

18世纪50年代以后，英国已经把对华贸易作为其东方贸易的主体。不但船只的数量激增，由最初的几艘增至20余艘，最多达34艘；船的吨位也不断加大，由500吨位以下，增至700吨位以上，最大者达922吨位。当时驶往中国的船只，堪称是英国最大型的商船，而同期航行大西洋的商船只有三四百吨位。

除了茶叶，中国的瓷器体现了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完美结合。对于远洋商船来说，瓷器还具有压舱货的重要作用。由于它重量大，不怕受潮，装载在船的底舱，既可防止茶叶、丝绸受损，又保证了商船的平稳航行。可以说瓷器、丝绸和茶叶，是当时中英间海运货物的最佳组合，这也是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经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对华贸易为英国提供了巨额的商业利润。东印度公司仅从茶叶贸易中就赚取了惊人的利润。18世纪初，东印度公司进口每磅茶叶的费用为2.4先令，运抵伦敦市场上的销售价则高达14.8先令。18世纪40年代，前者降至1先令，利润空间更大。^①

当时来华的英国商船，经马六甲海峡大多驶抵广州交易。据统计，从1685年“禁海”令解除，到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来华船只共计189艘，其中广州157艘，占总数的83%；厦门17艘，占9%；舟山15艘，占8%。其中1737年至1753年的16年间，英国商船全在广州锚泊。^②

随着中英贸易的推进和对中国了解的增多，英国人的眼光不再局限于广州，而是向北延伸，并聚焦于更靠近茶、丝产地的浙江宁波。1755年6月，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乘船直驶宁波，为首的英国人的汉语名字叫洪任辉，能说汉语，人称中国通。英国人的这种举动，引起清政府的警觉。闽浙总督杨应琚奏称，浙江洋面的天险和防务均不如广东，江南财富重地，不能听任洋船自由出入，对外通商应限于广州一口。乾隆帝也认为：“浙民习俗易器，洋商错处，必致滋事，若不立法堵绝，恐将来到浙者众，宁波又成一洋船市集之

^① 郭成康等：《康乾盛世历史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372、373、386、387页。

^② 李国荣主编：《帝国商行：广州十三行》，九州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所，内地海疆，关系紧要。”^①遂于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宣布对欧美国家的贸易，只准在广州进行，史称“一口通商”禁令。

清政府的举措，使旨在拓展中国市场的英国人大为扫兴，也很不甘心。1759年，洪任辉受命乘船北上天津，要求清政府允许在宁波通商，并控告粤海关贪污勒索等弊端。英船竟然未经许可，径直驶抵距北京不远的天津海口，令清政府很震惊。为平息事态，一面派人押解洪任辉从陆路返回广州，一面着手调查洪任辉的控告。不久，查证粤海关监督李永标贪污属实，革职处分，洪任辉则以违例别通海关罪，遣送澳门圈禁三年，期满驱逐回国。

针对英国人增开通商口岸的要求，清政府坚持广州一口通商的禁令，并加强了对广州外国商人的管束。1759年即洪任辉北上天津事发当年，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防范外夷规条》，规定禁止外国商人在广州过冬；外国商人在广州必须住在政府指定的行商的商馆中，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中国人不得向外国商人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中国人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船停泊处，派兵弹压稽查。事态的演变，与英国人的期望大相径庭，失望之余，决意寻找机会，再作努力。

二

广州一口通商时期，清政府实行的是行商制度。广州的对外贸易，由清政府特许的“十三行”商人专营。外国商人来到广州，实际接触的只限于这些行商。享有特权的行商，一方面是垄断性的商业机构，凡是外国进口货物，均由其承销，内地出口商品，也由其代购，并负责规定进出口货物的价格；另一方面，行商又受政府委托，执行外交上的职能，在广州的外商不能和当地官府直接交往，由行商代政府办理中外交涉，转递文书。

清朝政府旨在利用行商避免与外商发生直接关系，行商实际充

^① 《清高宗圣训》卷281，第5页。

当了清朝政府与外商之间各种交涉的中间人，诸如“为当地政府处理有关外国人居留和福利的事；广州港每年的总贸易额高达数百万元，作为其监护者，他们的责任是重大的，他们要对违纪的行为负责，必须能够有效地控制广州和黄埔的外商和船只的活动，因此侨民和船都必须有担保，行商则成为‘保商’，他们得补偿政府的任何损失”^①。

在政府的授权下，“十三行”商人总揽了广州的对外贸易，从中获利巨大，并因此与粤海关监督及广东地方官员结成盘根错节的既得利益集团。1817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的随行医生麦克劳德记述：

“广州行商给予其欧洲朋友的款待非常盛大，在大厅内就餐的人数上百，宴席的摆设通常是按我们的风格（尽管他们也使用筷子用餐），丰盛的美食、酒水和瓜果摆满一桌，燕窝汤作为一道大菜也上了桌，中国人认为它有特殊的滋补作用。”^②

同一使团的依里斯记述，行商伍浩官的住宅富丽堂皇，“这座别墅或不如称之为宫殿，分成若干套间，用镀金和雕刻装饰得华丽美观”^③。其财富，据估计“按他拥有的稻田、住宅、商店及所谓兑钱的银号，还有他在美、英船运业的投资，1834年共有2600万元”^④。

行商的外贸特许权是用重金换得，为维持其特权，又要不断向官府行贿、“报效”。在官府方面，则把行商视为摇钱树，动辄巧立名目，伸手索取。十三行每年上缴税银超过百万，据档案记载，皇帝把十三行作为固定的财源，常常亲自审查税费的解交，如有出入，便拿粤海关监督是问。十三行每年为宫廷输送洋货，当时称为“采办官物”，其中多为紫檀、象牙、珐琅、鼻烟、钟表、玻璃和金银器

① [英] 詹姆士·奥朗奇编著，何高济译：《中国通商图：17—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页。

② 同上，第133页。

③ 同上，第182页。

④ 同上，第182页。

皿、毛织品等。根据皇室的要求和出具的样式，行商从洋商手中逐件采买，再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和粤海关监督进献。查阅清宫《进单》、《贡档》便可发现，一口通商后，宫廷享用的洋货几乎全由广州行商输送。嘉庆帝偏爱南洋热带水果，曾特为批示“槟榔一项朕时常服用，每次随贡呈进无误”。^①

广州的行商，并非全是广东人，有的来自毗邻的福建。其中同文行的潘启官，祖籍福建漳州龙溪，后迁同安县，从事海外贸易多年，积有余资后到广州发展；义丰行的蔡氏，祖籍也是福建；义成行的叶仁官，原籍福建詔安县；丽泉行的潘氏，原籍同安县；怡和行的伍浩官，祖籍福建莆田，后迁晋江，康熙初年又迁广东南海。^②这与明清时期福建沿海私人海外贸易相当活跃有关，他们从中积累了经验和资金，并得到广州继续发展。

当时坐镇广东的粤海关监督，由皇帝钦定，多是由来自京城的宫廷内务府官员出任。根据清宫关税档案记载，粤海关每年的税银有3%移交广东布政司藩库，3%留作海关之用，70%解交户部，24%划归宫廷内务府。粤海关有自成独立的系统为宫廷服务，这一官职被视为美差和利藪，非皇帝亲信之人是难以上任的。当时两广总督的年薪为2万银两，而粤海关监督的年收入可达40万银两。^③后者几乎一上任都贪得无厌，因为这个肥缺是要经常换人的，凡上任者都想在短暂的任内捞足吃饱。

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在北京下榻的海淀宏雅园，就是被查抄的一名前粤海关监督的园林式私宅。据随团的画家威廉·亚历山大记述：

“里边有一座像带篷的驳船样的房子，船体用石块造成，建在一个蓄满水的池子里，必要时用水桶从邻近的水井里向池子蓄水。这

① 李国荣主编：《清宫档案揭密》，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第338、339、346页。

② 郭卫东：《转折——以早期中英关系和〈南京条约〉为考察中心》，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46页。

③ 李国荣主编：《帝国商行》，第41、242页。



个古怪建筑的上层用作使团的餐厅。石块和种着矮树的花盆，错落有致地排列着，某种程度上从小处表现了中国园林装饰的品味。从石舫的屋顶和这座巨大庭院的院墙上边远望，可以看到北京城的几座塔顶、牌坊和其他一些建筑。这座巨大的官邸，是由广东的税官建造的。他后来被提升为天津的盐税官，但他的欺骗和勒索行为被发现，全部巨额财产被皇帝没收。”^①

使团副使斯当东也描述说：“（宏雅园）馆舍宽阔华美，厅房甚多。据说这个产业属于前任粤海关监督，他从对英贸易中贪污大宗款项修建这所住宅，以后调任北京附近，继续贪污，最后被处分抄家，产业没收归公。”^② 这些贪婪的官员在任期间，对十三行商人的索求自然也是毫不客气的^③；而后者为了应付，往往挪用拖欠外商的贷款，当时来华的英国商人多有抱怨^④。

三

1831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发生了议会改革。原先的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被打破，工业资本家进入议会。接着，根据议会的决议，英国政府在1834年废除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的专利权。任何英商都可以自由去中国进行贸易。这是英国资产阶级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重要措施，也是英国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转折。

在这以前，中英双边贸易是由两国的商业垄断机构——中国的

① 刘潞、[英] 吴芳思编译：《帝国掠影——英国访华使团画笔下的清代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

② 同上，第108页。

③ 作为对政府给予经商特权的回报，十三行商人对政府不时的所谓“报效”也是巨额的。有资料载，“1841年他们替广州城支付了600万元赎金中的200万元”，详可参阅[英] 詹姆士·奥朗奇编著，何高济译：《中国通商图：17—19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第12页。

④ 详可参阅严中平：《英国资产阶级纺织利益集团与两次鸦片战争的史料》，载经君健编：《严中平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9—196页。